

# 在帝國的出口和夾縫，那些失去國家的人： 中亞綠洲島鏈的破碎



粟特商人

(引自：維基共享資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ogdianMerchants.jpg>)

廖宜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4 期 2025.6

臺灣是海中的島，綠洲是沙漠中的島。不論在陸權或海權的時代，帝國都在尋求出口。海洋不是阻隔——在茫茫無垠的黃沙之間，同樣也有通道。七世紀和八世紀的塔克拉馬干沙漠和塔里木盆地，同樣是帝國交鋒的戰場。中華的皇帝、突厥的可汗、吐蕃的贊普和伊斯蘭的哈里發，不但有欲望，而且有交通工具，能夠渡越這片起伏的沙海與環繞的山嶺。中華、阿拉伯人（大食）、突厥與吐蕃在這片彼此的「夾縫」爭奪控制權，來自北、東、南三個方向的軍隊先後進占環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城邦串起的「島鏈」。除了「島鏈」、「帝國的夾縫」、「帝國的出（海）口」，臺灣和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城邦，還有其他相似、共有的處境，像是「外來統治」、「重層性格」等。這些地方和臺灣一樣，也是許多人群層疊而成的家園：先住民、舊移民和新住民。這些綠洲邦國的歷史和「臺灣島史」一樣難以敘述，因為他們的歷史也被切割在不同時期的政權：歷經反覆的戰爭，不斷遭受外來統治，被重層征服、殖民和移占。本文的目標之一，想讓讀者將臺灣的處境與經驗，連結上其他中華周邊、外圍和對面的地方與人群，從而理解歷史的獨特性、普遍性與共通性的微妙。

本文有一個核心的提問：失去國家和國王，即喪失政治權威和統治結構，會怎麼樣？在帝國爭霸的敘事裡，讀者熟悉草原牧民與中華的抗衡、戰爭的勝利或失敗，但很少關心，那些被帝國征服、擊敗和佔領的人，後來到底怎麼了？很少人會想：戰敗、潰散的人群和國家，其造成的「政治破碎」，會有什麼結果？這些人群在強權的擠壓下破碎散裂，失去自己的城邦、國王和國家，這些失敗的人後來到底怎麼了？離散、流亡，或留下來？

這個故事設置了兩個地點：吐魯番和龜茲。以下從生活在當地的兩個人：一位是亡國之民，一位是邊境關卡的檢查員，由他們的生平和視角，呈現他們的生命與世變。有些人只能服從、協力，被驅策、動員去征服和管理更遙遠的邊疆，渡過餘生，但另外一些人民，則見機起事和反叛——他們彼此連結，對抗強權。帝國因此而顛簸，人的創傷激發了奮起之心。

— ①

西元六五一年，十九歲的張懷寂踏上回鄉的路途。離開第二故鄉洛陽後，他中途先在長安與故主麴氏一家會合，<sup>②</sup>再一同返回原鄉：吐魯番盆地的「西州」。這是唐

① 這個小節的研究和寫作技巧是「拼湊訊息」，不斷交叉比對張懷寂家族三代人的經歷，從而推導出許多史料所無的新訊息，更結合人物所處的時代與環境，生動呈現這個小人物的生命史。

② 本節有關張懷寂一家的基本資料：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碑志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575, 595, 610。張懷寂死於長壽二年（693），隔年下葬。實歲為61，因此推測生於632年。張懷寂的告身，可見小笠原宣秀、大庭脩，〈龍谷大學所藏吐魯番出土の張懷寂告身について〉，《龍谷大學論集》（京都）

帝國統治下官方的命名，但麴氏和張懷寂等人則有另一個稱呼：「高昌」。<sup>③</sup>如今張懷寂和麴氏都是唐的臣民，但麴氏過去是高昌的王族。兩家關係密切，彼此通婚，堪稱是高昌國權勢最大的兩家，張懷寂的母親就姓麴。但在十一年前，因為被唐征服和併吞，麴、張兩家和其他大族被強遷到帝國就近監視和掌控之地。

張懷寂在洛陽一帶居住十一年，張家時而寫信回鄉與族人報平安，斷斷續續保持聯繫，也在洛陽的龍門石窟向大佛祈福。<sup>④</sup>其實，留在故鄉的族人面臨比較多的危險：因為高昌成爲唐與突厥衝突的最前線，張懷寂離開才兩年，高昌就遭遇西突厥進攻的威脅。<sup>⑤</sup>但又經過九年，麴氏和張氏等高昌在地的舊勢力，被唐帝國賦予重任，授予官職，要求他們加入中華與突厥、吐蕃在中亞綠洲城邦的地緣政治的抗衡中。亡國之人好不容易倖存下來，在他鄉適應新生活，卻無從料想返鄉的契機竟然是踏入戰爭的死亡陰影。張懷寂從此再也不曾重返中華。

張懷寂對十一年前的亡國之戰記憶猶新。當年才八歲的張懷寂身爲貴族子弟，和家人與國人在唐的大軍兵臨城下之際，懷抱悲傷一同參加老國王麴文泰的葬禮，<sup>⑥</sup>隨後經歷了圍城時敵軍的投石車彈如雨下、投降與亡國的恐懼。懷寂的父親和老國王約略同輩，在他兩歲時過世。<sup>⑦</sup>懷寂的父執輩在世的那些年，高昌的政治已經開始動蕩：<sup>⑧</sup>突厥人是天山北側、整個中亞草原最強大的帝國，而在沙漠東側的中華，數百年首度出現統一的王權：新興的隋唐帝國。高昌感受到兩側、還有南方的吐蕃崛起的壓力，更別說鄰近綠洲城邦國家之間長久的不合與利益衝突。高昌甚至出現了政變和禮俗改革的運動：<sup>⑨</sup>究竟應該保留草原的風習，亦或重新「再漢化」？和所有外交與內政交逼、政治與文化連動的國家一樣，高昌也搖擺不定：不只是國策方針，人心也是。

這個難解的局面在西元六四〇年以唐帝國出兵劃下句點。高昌位處突厥勢力範圍下綠洲島鏈的最東端，在這片沙漠的大海，高昌國成爲中華向西進擊、首當其衝的出

359 (1958)；後收入大庭脩，《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階制》(伊勢：皇學館出版部，2003)，頁 211-227。相關研究見陳國燦，〈跋《武周張懷寂墓誌》〉，收入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2 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0)，頁 18-22。家族歷史見吳震，〈麴氏高昌國史索隱——從張雄夫婦墓誌談起〉，《文物》1981.1：38-46；宋曉梅，〈麴氏高昌國張氏之仕宦——張氏家族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91.2：198-206。

③「高昌」的稱呼：孟憲實，《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336-356。

④家書與祈福：裴成國，〈高昌國末年以降碑志書寫中的「高昌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0.1 (2020)：99；家書見裴成國，〈唐朝初年西州人與洛州親屬間的幾通家書〉，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22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321-355。

⑤ 642-643 年西突厥的威脅：劉安志，〈讀吐魯番所出《唐貞觀十七年(643 年)西州奴俊延妻孫氏辯辭》及其相關文書〉，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22-32。

⑥ 老國王的葬禮：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六九，頁 2510-2511。

⑦ 父親過世：張雄死於延壽 10 年(633)。

⑧ 圍城之戰：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二二一，頁 6222。

⑨ 政變與文化變革：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359-421。

海口。高昌是個不足四萬戶口的國家，無意但不得已捲入唐與西突厥兩大強權的衝突。李世民發動十五萬的軍隊，首度試探性地越過沙漠發動進攻：如果成功，就能以高昌為楔子，撬開西突厥主宰中亞綠洲城邦的影響力；唐不一定能因此在中亞城邦的商業貿易中直接獲利，但足以阻止其他強權立足於此，發起對唐的挑戰。

張家和麴家雖然統治高昌，但在中華眼中，高昌並非漢人國家，而是胡人。<sup>10</sup>在西元前，高昌的先住民是車師人，<sup>11</sup>當時也同樣夾在中華與草原游牧帝國、漢與匈奴的縫隙中；雙方歷經近半世紀的反覆爭奪，車師終於亡國，<sup>12</sup>這裡第一次成為中華的出口。張家和麴家的祖先，就是來自中華的士兵。未能西逃、留下來的車師人與中華派遣的士兵通婚共存。張懷寂的母系可能就有車師人的血統。<sup>13</sup>張家在高昌以漢人的身分自傲，炫耀自己的祖先來自甘肅走廊的敦煌；<sup>14</sup>但在唐的征服者的眼中，他們是夷人——至少半華半夷，儘管說漢語，但數百年來，服裝、髮式和口音用語都已和中華本土的演變相去甚遠。

西元三世紀之後，當中華與游牧帝國都無力介入，這裡又有機會成為獨立的國家，而麴家、張家也從外來的駐軍，逐漸躍升成當地的領袖。雖然高昌的國家機構和高層文化都使用漢字，<sup>15</sup>但基層和底層的車師人仍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這是和鄰近邦國的胡人先住民相近的語文。<sup>16</sup>在塔里木盆地周緣的綠洲邦國中，由漢人主導的高昌其實是異類。不過，統治高層的漢人和社會基層的胡人共享同一種信仰與生活：佛教。

在懷寂出生前三年，默默無聞的僧人玄奘闖越關卡，通過沙漠來到高昌，老國王鞠文泰欣賞這個勇敢、堅毅且聰慧的年輕人。國王和母親張太妃禮遇玄奘，而張太妃正是懷寂父親的姑姑。<sup>17</sup>多年後，玄奘返回中華、受到皇帝歡迎的消息傳開，當時人已在洛陽的懷寂聽母親說起當年的回憶：她和皇室、張家等貴族計三百多人曾經聚集

- <sup>10</sup> 高昌人被視為夷胡：孟憲實，《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頁 341-342；裴成國，〈論貞觀十四年以降的唐西州形勢〉，收入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 13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92。
- <sup>11</sup> 車師的種族：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頁 29-47。
- <sup>12</sup> 五爭車師：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頁 48-63。
- <sup>13</sup> 高昌的族群：杜斗城、鄭炳林，〈高昌王國的民族和人口結構〉，《西北民族研究》1988.2：80-86, 282；王欣，〈高昌漢人的族群認同〉，《西域研究》2013.4：58-66。
- <sup>14</sup> 張氏的淵源：錢伯泉，〈敦煌張氏家族和高昌張氏家族的關係〉，《吐魯番學研究》2022.1：1-12, 153。
- <sup>15</sup> 高昌國統治機構與統治階層的漢文化：陳國燦，〈從吐魯番出土文獻看高昌王國〉，《蘭州大學學報》31.4（2003）：1-9。
- <sup>16</sup> 高昌的社會基層和底層，除了漢人、粟特、突厥，還存在過去的車師人使用俗稱的「吐火羅語」：侯燦，〈環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及其文化〉，《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2：31-34；吳震，〈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收入氏著，《吳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374-389；關尾史郎著，侯世新譯，〈論「作人」〉，《西域研究》1995.1：51-57；荒川正晴著，沈玉陵、平勁松譯，〈唐代吐魯番高昌城周邊的水利開發與非漢人居民〉，《吐魯番學研究》2013.2：122-131。另外，鄰近的焉耆仍使用吐火羅語。
- <sup>17</sup> 玄奘與高昌：陳國燦，〈玄奘與高昌王國〉，《吐魯番學研究》2014.2：6-12；孟憲實，〈麴文泰與佛教〉，收入氏著，《出土文獻與中古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193-206。

在一座大帳篷，虔誠聆聽當年的年輕比丘玄奘講述《仁王經》。<sup>18</sup> 玄奘還和老國王結為兄弟，尊張太妃為母。母親還說：為了幫助玄奘前往印度，老國王寫了很多信，並提供資金和人脈，沒想到他真的平安、成功回來。懷寂心想：但老國王和高昌都已經不在了——人世無常，這不正是佛陀教給我們的道理嗎？

離鄉十年之後，張懷寂和兄長、母親一同重返高昌，與族人相見，互相傾訴這些年的遭遇。懷寂發現家鄉發生很大的轉變：大量的外來移民遍布在城、郊與鄉。過去十年，每年至少上千人從中華被徵調到高昌。<sup>19</sup> 如今增加至少近萬人，約略是高昌亡國時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使得糧食、衣服和土房的供應短缺而緊張。不只本地人要適應外來者，外來的移民之間也必須彼此適應。因為除了官吏和專業軍人，被派赴高昌的人中有不少是罪犯，包括死刑犯和流放犯，其中有些人真的不是善類。他們和正規士兵一樣，以集團為單位遣送，同樣也在這裡集體勞動和生活。這些下層人被官僚支配和奴役，被強健而高傲的軍人輕蔑，不完全自由而且生活條件很差。這個異質而混雜的移民群體，大多數人都不想來高昌，充斥著複雜的情緒：對人生的絕望、對生活的不滿意，以及對家鄉的思念，所有這一切都增加了衝突的風險，使得官吏的管理更困難。如今，懷寂也必須重新適應家鄉的新面貌。

這些中華移民一起打造了外來統治的樣貌。唐帝國剛征服高昌時，其實有兩種不同的統治方針可供採擇：自治，或納入直屬的領土。<sup>20</sup> 如果採納前者，張懷寂可以留在家鄉長大，麴氏會被扶植，成為唐帝國在這一帶的區域代理人，也不需要派遣這麼多移民。但皇帝選擇後者。這意味改名西州的高昌，必須推動與中華本土一致的制度：包括設置官署、分配土地、調度勞動力等；土地與人力資源的管理，必須精確到每一個家庭和人口的數目。李世民獲得的數字是：「家戶八千四十六，戶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八，馬四千三百。」<sup>21</sup> 然而，與其說帝國統治體制必然延伸、移植到新的領土，倒不如說皇帝很清楚，只有直接統治才能以嚴格精密的管理，催出高昌最大的潛力，把這裡變成中華向西擴張的軍事殖民地：一座進軍的橋頭堡，兼退守的後勤基地。

從出兵高昌到占領、併吞，在唐帝國的統治高層中，並非毫無異議。大臣洞悉皇帝的意圖和野心，表示反對，<sup>22</sup> 但皇帝一意孤行。李世民有自信，但維持不到兩年就後悔了，<sup>23</sup> 因為高昌遭遇突厥人的威脅，一度情勢危急。但李世民表示後悔的當下，

<sup>18</sup> 講經：唐·慧立著，彥棕箋，賈二強譯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1），頁19-24。

<sup>19</sup> 人口遷徙：劉安志，〈唐初西州的人口遷移〉，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頁15-18。

<sup>20</sup> 高昌直屬或自治（羈縻）的差別，可和焉耆互相比較：裴成國，〈論5-8世紀吐魯番與焉耆的關係〉，《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3（2016）：127-132。

<sup>21</sup> 數字：北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九五，頁1701-1702。

<sup>22</sup> 魏徵和褚遂良都反對：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頁6-7, 22-25。

<sup>23</sup> 李世民的後悔：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28。

不可能預見接下來七年，他布署的大軍竟然又向西成功攻陷兩個邦國：焉耆和龜茲，國王和麴氏一樣被俘虜。這些輝煌的勝利又讓他忘記自己的懺悔。皇帝的心情就是這樣浮動且善變，因為一時的得失而自豪或悔恨。

因此，雖然唐成功統治高昌長達一個半世紀，但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的大戰略。因為在這段時間，唐也打了許多敗仗，突厥人分裂之後又團結，衰落之後再復起，這些都在中華的預期和計畫之外。不只像懷寂這樣的小人物不由自主被東遷西移，就連操盤的皇帝也無法掌控大局，各種勝利和失敗都有偶然的因素。李世民死後，臣服的突厥降將立刻反叛；<sup>24</sup> 皇帝若地下有知一定又要後悔。但正因為這場新爆發的危機，張懷寂才踏上返鄉的旅程。

有些和懷寂一同返鄉的人，沒多久就死了：因為年紀大或染病，但有人和懷寂一樣年輕卻早逝。懷寂是重新適應家鄉、生存下來的幸運兒。<sup>25</sup> 他返鄉之後七年的局勢相當緊張，中華與游牧帝國、唐與突厥爆發了三場大戰，中華至少動員數十萬人的軍隊，其中第一次進軍由漢人與回紇人組成的聯軍就高達八萬。<sup>26</sup> 高昌日常的文書作業已經很繁複，戰時的軍事行政又更緊急。整個軍事機器運轉起來，像張懷寂這樣的小齒輪比平常更忙碌，壓力山大。這是他在唐帝國的第一份工作，經常受上司指派去處理不同部門的事務，長官也藉此觀察他是否適任。他的身分是文官，需要和同僚討論、批示公文：像是倉庫糧食的出納、官馬死亡、士兵沒有按時值班、官田出租的憑證、核發通行憑證以便通過守衛的關卡等。<sup>27</sup>

高昌作為唐進可攻、退必守的基地，有關軍人的事務最為繁雜，比如打仗獲得嘉獎，戰死或生還的士兵需要造冊統計人數等。戰爭的勝負不只是攻城野戰的搏殺，後勤的管理也是關鍵。中華出身的軍人不一定能在草原和沙漠勝過游牧民族，但正因有諸多像懷寂這樣的官僚以精密的理性運作，使唐帝國取得最終的勝利。藉由這些協力的作為，懷寂也成為高昌新秩序的一分子。十歲以前的他是高昌國首屈一指的貴族成員，青少年的他是個失落在中華的異鄉人，二十歲以後的他是西州眾多實務官僚中平凡的一員。雖然他的社會位階滑落，<sup>28</sup> 但他在新秩序中逐漸安身立命。返鄉後第四年，二十三歲的他與妻子生下第一個孩子，取名為張禮臣。<sup>29</sup> 兩年後的西元六五七

<sup>24</sup> 這是指阿史那賀魯的反叛。

<sup>25</sup> 返鄉人的死亡：超過五十歲的死者如張團兒、二十多歲的年輕死者如張善和，見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碑志集注》，頁 471, 491。

<sup>26</sup> 唐征討阿史那賀魯的第一場戰爭：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391。

<sup>27</sup> 西州參軍的公務：李方，《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頁 154-180。

<sup>28</sup> 社會位階的變化：白須淨真著，柳洪亮譯，《吐魯番的古代社會——新興平民階層的崛起與望族的沒落》，《西域研究》1999.4：45-54。

<sup>29</sup> 張禮臣生於 655 年：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碑志集注》，頁 610。

年，因為擴張，唐設在高昌的軍事指揮部向西遷移到更遠的龜茲，<sup>30</sup>高昌的壓力稍微減輕，但依然是唐在中華西側從周邊與外圍進入對面，最重要的基地。

懷寂的兄長張定和則加入唐帝國的軍隊，成為主力部隊（府兵）的軍官，過著比弟弟更緊張、風險更高的生活。<sup>31</sup>兩兄弟一文一武，在新秩序中找到自己職涯的道路。唐在高昌設置在中亞的第一個軍事指揮部，並派駐四個軍團，以確保這個城邦的安全。不同身分組成的駐軍至少五千人，<sup>32</sup>甚至更多，這對高昌約五萬人的平民而言，是不小的負擔。生活的氣氛也與定和、懷寂兄弟小時候有很大的差別。高昌成為中華向中亞擴張的最前線：既處於最容易受攻擊的位置，也處於發動攻擊的位置。四周的人群充滿敵意，而且不斷出現新的敵人：西突厥、東突厥和吐蕃人。

官方布建層層疊疊、密密麻麻的防禦體系：幸運的人留在比較安全的基地或驛站服役，監看交通要道；不幸的人被指派到最外圍的鎮、戍、烽、墩，<sup>33</sup>日夜守望遠方的沙漠是否出現可疑的異狀，並傳遞情報。士兵如果能從戰鬥生還，成為幹練的老兵，有機會依制度的規定返回中華的故鄉，條件是帝國的運作正常。但現實是愈來愈多老兵無法退伍返鄉，被迫留守在陌生的異鄉——因為帝國的兵員供應不上頻繁的戰爭。

如果沒有死於戰場、被俘或殘疾，有些士兵會慢慢習慣高昌的沙粒與星辰，寒冷、嚴熱與乾燥，在這裡逐漸變老，滿臉風霜，安頓下來，娶當地女子為妻，<sup>34</sup>擁有自己小小的家。中華歷史上被派赴周邊、外圍與對面的駐軍，從張懷寂的祖先到二十世紀的解放軍，幾乎都有相似的命運。張定和比弟弟先過世，死前當上四個軍團之一的長官，領導這一群不快樂的士兵。軍隊的管理從來都不容易，有人遭到棍棒毆打的暴力體罰，有人因此被投訴。<sup>35</sup>被沙漠包圍、無法逃亡的士兵，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焦慮與恐懼、疼痛與創傷、寂寞與思念。

定和與懷寂兩兄弟努力工作，將故鄉改造成以軍事為優先的社會。這個小綠洲城邦的財富再也無法像以前老國王在世時那樣揮霍，以黃金慷慨資助玄奘留學印度二十年。過去，佛教寺院是人們信仰與生活中心，但這裡變成帝國的前線之後，一切都以

<sup>30</sup> 安西大都督府與四鎮：張廣達，〈唐滅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勢〉，收入氏著，《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43-148。

<sup>31</sup> 張定和無誌，其人生平僅見於兄弟張懷寂的墓誌。

<sup>32</sup> 唐在西州設立四個軍府，每個軍府約千人左右，此外還有「鎮兵」。駐軍人數約略在五千至一萬之間。

<sup>33</sup> 防禦體系：西州當地的例子，見陳國燦，〈唐西州蒲昌府防區內的鎮戍與館驛〉，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頁85-105。

<sup>34</sup> 通婚：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頁19，討論另見劉安志，〈讀吐魯番所出《唐貞觀十七年（643年）西州奴俊延妻孫氏辯辭》及其相關文書〉。

<sup>35</sup> 軍事化管理：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00-118。

勞動至上：許多寺院被裁撤整併，少了一半以上。<sup>36</sup>各種資源優先滿足軍事的需求：每一小片破碎的土地都需要有人耕作，每一個人力都要勞動，從種田、放牧，到修建灌溉水渠和碉堡，連牛、馬等動物的畜力都被充分利用，去完成軍事、準軍事和半軍事各種任務。不論什麼階級、族群和身分地位，都必須為守衛高昌而付出。

這裡是個和風沙一樣不斷「流動」的社會：以前只有作生意的粟特人穿梭來往，如今每年有上千人從東方被移送來，一支又一支西征的部隊再從高昌出發；如果戰敗，垂頭喪氣的殘兵會回到這裡整補，幸運的人獲准返回中華。死亡還帶來另一種流動：活著的人必須去遞補死者的位置和工作，承擔被分配的責任。當唐帝國控制的範圍向西擴張，高昌的本地人會被派往更遠的地方去服務和打仗。

懷寂和妻子生的小孩張禮臣平安存活。懷寂四十歲之前，有段時光能和妻兒、母親與兄長一家三代人，過上一段歲月靜好的日子，他們會一起到佛寺聽經祈福；母親常和鄰里婦女籌錢組成社團，舉辦齋會，追思逝世多年的親人。<sup>37</sup>張禮臣也在佛寺學習漢字——這孩子對於佛陀的信仰，也從此扎根。<sup>38</sup>現世安穩是因為唐帝國的威懾力量在這段期間達到第一次巔峰。中華以跳島的方式西進，終於逐步掌控絲路的綠洲島鏈，向西遠達帕米爾高原。除了將軍事指揮部遷往龜茲，更在沙漠之海設立四個軍事基地，<sup>39</sup>作為投放軍力或打擊部隊的前哨站。這四個基地過去都是塔里木盆地先住民的邦國，如今納入中華，形成胡漢結合的軍政體制。但沒有一個地方像高昌那樣，成為直接統治的領土。<sup>40</sup>

當帝國節節西進，張懷寂非常幸運沒有被派遣到最西、最遠與最危險的地方，反而大多是往東調動，任職於相對安全之地。<sup>41</sup>但四十歲以後的懷寂，在他人生的最後二十幾年，卻變得動蕩。唐帝國的霸權一再遭到挑戰，節節敗退：軍事指揮部幾度撤守遷回高昌，四個前線基地三度被攻陷，也三度收回。懷寂身在其中，其實感受不到整體情勢的推移變化，無從瞭解每一次的勝利和失敗。勝利的歡娛很短暫，但不安卻一直持續。他感受不到帝國的強大，反而是時勝時敗、起落不定。唐帝國不只在邊疆遭遇挫折，政權的中樞也不平穩。懷寂五十七歲那一年，首都長安傳來的公文說：從明年起，皇后登基，國號改為「大周」。<sup>42</sup>直到死前，懷寂都認為，唐王朝已經永遠結束。

<sup>36</sup> 高昌寺院的變化：姚崇新，〈從高昌到西州——中古吐魯番佛教寺院社會功能的轉變〉，收入氏著，《觀音與神僧——中古宗教藝術與西域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1-46。

<sup>37</sup> 婦女齋會：郭峰，〈吐魯番出土眾阿婆社約與唐代西州的民間結社活動〉，收入氏著，《唐史與敦煌文獻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30-237。

<sup>38</sup> 寺院與漢字教學：姚崇新，〈從高昌到西州——中古吐魯番佛教寺院社會功能的轉變〉，頁41-43。

<sup>39</sup> 這裡指的是「四鎮」。

<sup>40</sup> 焉耆和龜茲沒有被劃為唐的領土，其實質的統治者龍氏和白氏則為唐效力。

<sup>41</sup> 張懷寂的任官之地為伊州、甘州和疊州，都在高昌之東。

<sup>42</sup> 西州公文中改用武周新字與國號「周」的時間點：見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

西元六九二年，懷寂六十歲，兄長和母親皆已過世，他如今成為張家的家長。他奉命加入唐帝國第三次收復前線四大基地的戰役。他作為一個帶領千人部隊的小主管，<sup>43</sup> 投身對抗吐蕃人、突厥人的聯軍。唐帝國幸運贏得這場戰爭，懷寂也活下來，親眼見證勝利，甚至因功勞獲得賞賜。這大概是懷寂向西走得最遠的一次，結果他終究沒能平安返鄉回家，而是因故死在這趟遠征的路上。他的遺體被送回高昌下葬，與父親、母親、兄長合葬在家族墓地。<sup>44</sup> 兒子張禮臣在靈前為他日夜誦唸佛經，虔誠祈求冥福，卻傷了身體。懷寂的壽命，同於當時高昌中上階層男子的平均歲數：六十。<sup>45</sup>

在高昌被唐統一之前的年代，這個數字是六十六。精英男子平均壽命下降十分之一，主因是頻繁的戰爭。實際上，還有多人活不到平均壽命，許多人連墓葬都沒有，被掩埋在滾滾的沙丘底下。高昌社會基層、底層的人，死亡率更高。這是中華周邊與外圍的人群，為帝國向對面的擴張而付出的宿命與代價。像定和、懷寂這樣半夷半華的本地人，往往比從中華派遣的移民更得力。這是同心圓、漸層式的「以夷治夷」：用中華周邊的人群去征服和統治外圍，再用外圍的人群推進到中華對面的土地。

## 一 46

張無瑒從小常聽父親說，自己出生那一年的冬天是龜茲最危險的時刻。繼高昌之後，龜茲成為八世紀唐帝國在塔里木盆地軍事指揮部的所在地：「安西大都護府」，遙控鄰近四個綠洲邦國的基地。西元七〇八年，唐帝國的遠征軍與突騎施（西突厥部族）激戰，但慘敗，唐的將軍和使節被殺，其中一人被擒，捆綁在驛站的柱子上被凌遲而死。<sup>47</sup> 突騎施大汗進而發動四支騎兵，攻擊龜茲等四處軍事基地。龜茲與高昌的聯絡被切斷，唐的守軍和突騎施在城的南面和西面交戰。

年》，頁 268-270。張懷寂死前獲得的告身頭銜，署為「大周」。武周建國與西域的關係：薛宗正，《北庭歷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屬西突厥左廂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79-180。

<sup>43</sup> 官位：「子行軍總管」。

<sup>44</sup> 家族墓地：陳倩，〈公元 6-8 世紀吐魯番阿斯塔納地區家族墓院研究——以張雄家族墓院為例〉，《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6（2015）：51-55。

<sup>45</sup> 平均壽命：裴成國，〈試論 6-8 世紀吐魯番地區人口平均年齡〉，《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6.3（2005）：19-24。

<sup>46</sup> 這一節則是受惠於 Susan Whitfield（魏泓）的啟發，並向她致敬。文中的小人物是張無瑒，除了名字實有其人，其人生的故事都是基於歷史事實的「虛構」：以龜茲為舞臺，從一個關吏的視角去呈現八世紀中華與阿拉伯、吐蕃、突騎施的歷史。

<sup>47</sup> 708 年的衝突：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 318-328；相關人物見蘇北海，《絲綢之路：龜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頁 127-128；鄭炳林、黃瑞娜，〈敦煌寫本《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遯真贊并序》與石城鎮粟特部落徙居敦煌考論〉，《敦煌學輯刊》2020.3：10-15。

張無瑒的父親身為士兵，常說起他參與的兩場戰役，敵我兩軍沿白馬河一路作戰：其中九天，雙方接戰十餘場，有時一天對陣兩場以上。<sup>48</sup>但半年之後，雙方停戰，唐正式承認突騎施的領袖為可汗。張無瑒的父親和同袍說起這件事，有人支持安西大都護府主管的外交是正確的，儘管他在戰場上失敗；有人歸咎另一位將軍的戰略，但他在戰場卻成功。<sup>49</sup>他們都是小兵，當然不曉得這場紛爭的起因牽扯到多少金錢的賄賂、權力的爭奪與陰謀，中央的政爭與外交的縱橫，才導致這場旋起旋滅的戰爭。唐最初攻打高昌的目標單純指向西突厥，但半世紀之後，向西拓展到龜茲的軍事指揮部，已經踩進幾個帝國之間的夾縫：吐蕃、突騎施和大食。

出生在唐的邊境、帝國的夾縫與交通要道，張無瑒小時並未養成國際視野，並不真正知道龜茲的戰略地位。但他對那些戰場一點都不陌生，因為父親在農忙和為軍府服役之餘，有時會帶著他和哥哥策馬郊遊，指點是哪一座土堡被圍攻，雙方爭奪哪一座橋梁，有時還撿拾到一些殘留的箭鏃，甚至沾血的遺骨。他和哥哥及年齡相近的玩伴只是期待那些翻越帕米爾高原的商隊和使節，帶來新奇的人事物。使節的目的地是唐的首都長安，裝載在駱駝背上的貨品都是獻給皇帝的禮物，張無瑒根本猜不出來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只知道是寶物。還有關在籠子裡的動物：獵犬、哈巴狗、羚羊、獅子、馴養的獵豹、色彩斑斕的鸚鵡；<sup>50</sup>儘管有專人照護，但看起來都病懨懨。甚至還有侏儒。<sup>51</sup>駱駝和驢、馬雖然常見，但各地獨特的品種和名稱都不同，只有見識經驗豐富的人才能辨識：像是流汗宛如滲血的馬，<sup>52</sup>或經過專門訓練才能打毬的馬。龜茲的老國王和新王子，上貢皇帝的特產也是本地養大的駿馬和獵犬。<sup>53</sup>

張無瑒喜歡動物，尤其是馬。他居住的屯堡分配工作時，他常搶著照料驛站和馬坊的馬匹，為他們鏟糞，或接受牧監指派，領去河邊吃草。<sup>54</sup>他十八歲那年，突騎施送來上千匹的駿馬互市：這是當地國際貿易一大盛事，常伴隨熱鬧的市集。但安西大都護府的長官因故拒絕交易，怒打使者。<sup>55</sup>張無瑒眼睜睜看著上千匹馬沒人照顧，在

<sup>48</sup> 戰事的詳情，關於戰事的敘述，見張君義文書的研究，如大庭脩著，李茹譯，〈敦煌發現的張君義文書研究〉，收入陝西歷史博物館編，《陝西歷史博物館論叢》第25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頁334-344；劉安志，〈敦煌所出張君義文書與唐中宗景龍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頁58-79。

<sup>49</sup> 這兩人分別是郭元振和周以悌。

<sup>50</sup> 唐玄宗開元年間中亞進貢的動物，見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360, 364-367, 382, 384, 391, 398。動物的相關研究，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93-230。；張廣達，〈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收入氏著，《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3-50。

<sup>51</sup> 侏儒：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382。

<sup>52</sup> 汗血馬來自當時的拔汗那（位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

<sup>53</sup> 龜茲王位的替換與進貢：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367, 374。

<sup>54</sup> 唐在龜茲的畜牧：張平，《龜茲文明——龜茲史地考古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97-202。

<sup>55</sup> 726年的衝突：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385-386。

大雪中凍斃，心痛不已。千匹馬的價值達兩萬匹絹，<sup>56</sup>不甘損失與受辱的突騎施可汗因此舉兵攻打龜茲，張無瑒體驗到他生平第一次的圍城。他想起父親說他出生那一年的冬天也是這樣危險。至此他明白父親為何與戰友爭論，因為安西大都護府的長官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不只是戰爭的勝敗，他們的判斷、個性與錯誤都足以左右此地的安危，其中包括張無瑒的命運。安西大都護府的長官正是唐在塔里木盆地的王，是帝國競合的「大政治」賽局底下，這個區域「小政治」的操盤者。

張無瑒小時聽父親說吐蕃是最可怕的敵人，但他自己印象最深的卻是突騎施。父親說吐蕃過去曾經攻陷龜茲三次，最後唐固定常駐三萬兵力、鎮守四大基地才穩固防線。但吐蕃並未放棄，仍企圖透過談判，要求唐撤軍，雙方瓜分土地。被拒絕後吐蕃仍不放棄，而是與其他反唐或不友華的強權聯繫：包括東突厥、西突厥、突騎施和大食等。這些策略未必都成功實現，但傳聞和謠言總讓張無瑒和父親憂慮不安。防線東側的高昌和甘肅走廊一帶，甚至比龜茲更常遭遇吐蕃的襲擊。吐蕃甚至迂迴繞道，從帕米爾高原以西，借路當地小國，企圖進攻龜茲。<sup>57</sup>

吐蕃所有外交和軍事的策動，最成功的是和突騎施結成有力的聯盟。張無瑒和父親兩代的惡夢合而為一。在他十九歲那年，吐蕃與突騎施首度聯手圍攻龜茲。<sup>58</sup>儘管唐的處境不利，仍挺了下來。張無瑒的父親和戰友修築的防禦工事極其可靠，用紅柳和蘆葦捆紮、與黃土交替鋪墊堆築而成的城牆厚達五層，<sup>59</sup>遊牧民族久攻不下。但有些比較分散和薄弱的戍堡仍被攻破，士兵的集體住所被破壞，陶罐被打破，劫掠一空。吐蕃和突騎施搶走許多絹帛當作戰利品。絹帛是士兵們的薪資，也是牧民最珍視的物品：若非自用，也能夠向西販賣獲利。吐蕃的歷史學者滿意地寫道：「屬民黔首也普遍獲得上好唐絹。」<sup>60</sup>唐帝國為維護這條通道而投注巨額的國防經費，這些資產成為遊牧民族覬覦的目標。

唐皇帝對兩個敵人的結盟，極為不滿。安西大都護府的長官發現雙方的使者偷偷穿越唐的領地互相聯絡，還攜帶禮物。這些暗夜潛行的情報員，有時被關哨監控的士兵發覺，爆發打鬥和死傷。這些情資都上報給皇帝。皇帝故意交還人和東西，以示譴責。<sup>61</sup>張無瑒難以明白，唐布置了那麼多的檢查哨和巡邏隊，竟然未能徹底隔絕兩個

<sup>56</sup> 互市和千匹馬的價值：姜伯勤，〈吐魯番敦煌文書所見的突騎施〉，《文物》1989.11：53-59。

<sup>57</sup> 吐蕃向中亞的擴張，與唐爭奪西域：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付建河譯，《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頁23-57；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68-164。

<sup>58</sup> 727年突騎施與吐蕃圍攻安西：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389-392。

<sup>59</sup> 城牆的建築：張平，〈龜茲考古中所見唐代重要駐屯史迹〉，收入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7），頁125。

<sup>60</sup> 引文：黃布凡、馬德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頁285。

<sup>61</sup> 秘密外交：吐蕃的特使被抓獲，見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389-390, 430-431；突騎施的特使被抓，見薛宗正，〈突騎施汗國的興亡〉，《歷史研究》1984.3：105-106。

敵人。他猜想一定有漏網之魚。此後，都督府的長官下令更嚴密監控沿線的守衛，但終究阻止不了游牧民族爲了自己的國家利益、進行獨立自主的外交：特使變得更小，向西繞更遠的路，行蹤更隱秘。

長大的張無錫被分配、指派到柘橛關，協助官員管理關卡的出與入。這裡是龜茲西側最重要的門戶，離都護府所在地約一日的行程。柘橛關橫跨白馬河，建有雙重的城牆。<sup>62</sup> 每當戰事緊急，有些士兵會躲進來。<sup>63</sup> 張無錫遵照長官的指示，特別留意來往的各種人，核對通行證上的姓名、年歲和身分，防止假冒；檢查行李，觀察和登錄馬的歲數、身上的膚色、耳鼻、烙印和特徵等；禁止金、鐵等能用於鑄造武器的物資出關。<sup>64</sup> 他也留意那些可疑的人，是否刺探基地和戍堡的守備和存糧多寡。<sup>65</sup>

西元七三四年，二十六歲的張無錫聽人說吐蕃贊普的王姐嫁給突騎施的可汗。<sup>66</sup> 突騎施與吐蕃升級爲「和親」的外交關係，與唐則陷入緊繃，雙方在同一年爆發衝突。<sup>67</sup> 斥候回報柘橛關以西的一處戍堡遭到圍攻，守將中箭命危。都督府長官宣布：東側的甘肅走廊已先派遣五千精銳的援軍，另一支五千人的部隊隨後跟上；朝廷將撥款二十萬段絹物的軍費，徵發四萬以上的軍隊。這些消息安定了張無錫等士兵的軍心。唐帝國的策略之一是以充沛的人力與物力打持久戰、消耗戰。針對游牧民族擅長的強攻與快攻，唐帝國深諳對付之道：戍堡的軍士雖然人少，但只要糧食充足，就能夠堅守。<sup>68</sup> 有些士兵在前一年獲准退役，<sup>69</sup> 在返回中華的路上聽說戰事爆發，無不慶幸逃過一劫。商業活動也因戰事中斷，有些家在龜茲的粟特人離鄉收帳，結果滯留在外。<sup>70</sup>

那一年，柘橛關的把守特別嚴格，但迎送也很頻繁。中華至少派出五支使節隊伍，目的地是帕米爾高原西側粟特人的小國。唐皇帝寫信給這些國王，備好禮物，拉攏他們加入唐的陣營，孤立突騎施。<sup>71</sup> 唐既然無法阻斷吐蕃與突騎施一南一北的聯繫，於是除了積極布署軍隊抗擊，也遣使與阿拉伯人在中亞的總督會晤，建立一東一

<sup>62</sup> 柘橛關和白寺城：王炳華，〈玉其土爾古城與唐安西柘橛關〉，收入氏著，《西域考古文存》（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頁164-180；劉安志，〈唐代龜茲白寺城初考〉，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頁173-180。

<sup>63</sup> 戍堡士兵的屯田與生活：見張平，《龜茲文明——龜茲史地考古研究》，頁189-300。

<sup>64</sup> 軍事關津的事務：黎虎，〈唐代軍鎮關津的涉外事務管理職能〉，《北方論叢》2000.2：77-82；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

<sup>65</sup> 刺探情報：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433。

<sup>66</sup> 吐蕃與突騎施的聯盟升級：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頁180；白桂思，《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頁78。

<sup>67</sup> 唐與大食共滅突騎施：除了王小甫、白桂思的著作之外，另見薛宗正，〈突騎施汗國的興亡〉；郭平梁，〈突騎施蘇祿傳補闕〉，《新疆社會科學》1988.4：47-60。

<sup>68</sup> 734年的軍情：張九齡起草的詔書有詳細的說明，詳見郭平梁，〈突騎施蘇祿傳補闕〉，以及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421-442。

<sup>69</sup> 前一年（733年）退役的士兵有孟懷福：見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頁62。

<sup>70</sup> 733年的這名粟特人是石染典：見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頁84。

<sup>71</sup> 734年唐玄宗遣使粟特：詳見郭平梁，〈突騎施蘇祿傳補闕〉。

西的戰略軸心，約定夾攻突騎施。張無瑒為這些任務重大的使節準備能夠翻越山嶺、腳程快又耐走的駱駝和馬匹，目送他們離開柘橛關。中華與阿拉伯人先後出兵，聯手瓦解突騎施汗國，前後費時三年，而吐蕃的援軍沒能幫上盟友。突騎施步上其前身西突厥的命運：人群分化，回復到次一級、更小單位的社群，失去了自己的最高領袖和「國家」——聯合行動的政治綱領與架構，更容易被利用和操縱，成為帕米爾高原東西兩側最新一批、失去國家的人。

張無瑒只是一介小關吏，當然無從得知這些外交官的使命，及其背後大國與強權政治的運作。但他年歲漸長，也逐漸能從使節通關的方向與多寡，猜想這個帝國夾縫之地捲進的國際政治局勢。比如說在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張無瑒至少見到八支中亞小國的使團赴華，通過柘橛關前往長安：<sup>72</sup>正和後一年形成強烈的對比。誰有求於人，才會主動遣使。這些小國多年來，屢次赴華請求唐皇帝領導抗擊阿拉伯人的入侵。其實，從唐統治高昌以來，早已得知大食（阿拉伯人）在遙遠的最西邊已經滅亡了一些老王國，比如波斯。<sup>73</sup>李隆基知道大食的擴張與強大，<sup>74</sup>但大食的威脅不比突騎施更近更急迫，所以始終不曾積極回應。他也很清楚粟特人退而求其次，指望突騎施挺身而出的心情。<sup>75</sup>因此，當唐與大食結盟、擊敗突騎施，粟特人頓失希望，備感親痛仇快。在柘橛關，張無瑒幾次看到阿拉伯人對粟特人的態度高傲，而粟特人的眼神也回懟仇恨的凶光。

唐對大食的理解很少，因為張無瑒很少見到被派往大食的使節，但大食赴唐的隊伍卻從未停止，<sup>76</sup>他在柘橛關接待過十幾團。他注意到大食人的膚色很深，鼻子大又長，留著鬍鬚。同伴之間雖然有身分地位的高低，但穿著相同，飲食也一起進餐。有時他們爭吵，卻不像其他胡人動手打起來。他們的衣著樸素，但腰間的銀帶和銀刀卻很耀眼。在柘橛關等候通關文件的審批時，大食人每天五次禮拜自己的神。龜茲盛產而聞名的葡萄酒，有些人滴口不入，對宴會上最富盛名的龜茲樂曲和舞女，也興趣缺缺。<sup>77</sup>

- <sup>72</sup> 八支使團：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411-421。
- <sup>73</sup> 阿拉伯滅亡波斯：姜伯勤，〈吐魯番文書所見的「波斯軍」〉，《中國史研究》1986.1：128-135。
- <sup>74</sup> 李隆基對大食的觀感：「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見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437。
- <sup>75</sup> 粟特、唐、突騎施與大食的複雜關係：許序雅，《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頁190-207；《唐朝與中亞九姓胡關係史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頁87-100。
- <sup>76</sup> 唐與大食的關係：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收入氏著，《中國伊斯蘭史存稿》（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頁56-103；張日銘著，姚繼德、沙德珍譯，《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薛宗正，〈怛羅斯之戰歷史溯源——唐與大食百年政治關係述略（651-751）〉，《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0.4（2000），頁85-100。大食赴唐的記錄：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頁93-97。
- <sup>77</sup> 對大食人的形容：唐·慧超著，張毅箋釋；唐·杜環著，張一純箋注，《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經行記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08-115, 45-57。

在突騎施戰敗亡國之前，粟特人是上一批失去國家的流亡難民。張無瑒見過的粟特人多半經商，但也有些武勇善鬥的精銳戰士；<sup>76</sup>另外有人擅長音樂、舞蹈，和龜茲本地的同行相得甚歡。從張無瑒懂得觀察以來，發現從西進入柘橛關的粟特人神色愈來愈倉惶，愈來愈窮，服飾不再像先前那麼華麗。他接待過的粟特人都對大食憤恨不已，指控他們殘忍毀滅自己的城邦：家園被燒毀，親人被殺或擄走為奴，有些人來華經商的目標是為籌贖金，將來尋回親人。

張無瑒二十歲以前，目睹過兩次較大的難民潮。<sup>77</sup>他不懂粟特的語文，只會簡單的招呼語，但聽翻譯的人轉述，勉強拼湊出一個不完整的故事：粟特人一再反抗大食的侵略，許多人失敗被殺。神廟被破壞，新統治者以改信伊斯蘭為條件，否則就課徵重稅。有位國王逃到山上抗戰，但也有國王出賣投靠的難民，但最後都被殺。<sup>80</sup>抵抗失敗的粟特人向外奔逃，為自己和後代尋找餘生：唐土收留了一部分，另一些人加入突騎施。<sup>81</sup>粟特人之間有時爭論應該依附哪一個勢力、未來該往何處去：草原或中華，突騎施或唐？不論去哪裡，常能遇到過去兩、三百年先移居的族人為之引介、作保。<sup>82</sup>在唐土，從龜茲到高昌的沿線，乃至整個中華與草原交界的地帶，從長安到東北亞的幽州（日後的北京），粟特人常有自己的聚落：離散的難民在這裡找到伸出援手的族人，彼此寫信互助。這些失去國王、城邦和國家的人，有些在異鄉的新住地習慣新生活，與漢人、突厥和突騎施通婚混血，服務新的領袖：唐的皇帝，或反唐的人。作為私屬的傭兵，新領袖要他們打誰，就打誰。<sup>83</sup>

三十九歲時，張無瑒迎來他生平僅見最常勝的將軍：高仙芝。赴任短短四年，<sup>84</sup>高仙芝一再攻破帕米爾高原一帶的小國，甚至獲得一個稱號：「中國山嶺之主」。<sup>85</sup>張無瑒記得他的最後一次大勝，擊潰一群已經失去領袖和國家的人：戰敗但不屈服的突騎施和離鄉流亡的粟特人。<sup>86</sup>每一次戰爭都讓柘橛關非常忙碌，除了部隊往返，外交

<sup>76</sup> 柘橛：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頁 111-130；芮傳明，〈「曳落河」與「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3：40-49；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著，阿米娜譯，〈粟特柘羯軍在中國〉，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35-240。

<sup>77</sup> 難民潮：這是指粟特人在 720-722 年，以及 728 年兩次起事及其挫敗。

<sup>80</sup> 粟特人與大食：B. A. 李特文斯基（B. A. Litvinsky）主編，馬小鶴譯，《中亞文明史·第 3 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頁 391-398；魏泓著，王姝婧、莫嘉靖譯，《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頁 21-52；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著，王睿譯，《粟特商人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173-178；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339-407。

<sup>81</sup> 粟特的流亡軍隊：白桂思，《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頁 66, 84。

<sup>82</sup> 保人：見前引注 70 石染典文書的討論。

<sup>83</sup> 私兵：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付馬譯，《絲綢之路上的帝國：青銅時代至今的中央歐亞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頁 12-22。

<sup>84</sup> 高仙芝的任期為 747-751 年：蘇北海，《絲綢之路：龜茲研究》，頁 132。

<sup>85</sup> 高仙芝的戰功：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頁 184-185。

<sup>86</sup> 流亡的粟特軍團：白桂思，《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頁 66, 84, 86, 88；張日銘，《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頁 45-46。

使節也最頻繁。在西元七五〇年這場大勝的前後，唐支持的一個小國不斷派遣使節赴華致謝，前後三次、分批超過八支隊伍，成員中還有王子裝扮的人。<sup>87</sup>但對唐失望、不滿和無禮的流亡粟特首領被俘，被鎖在檻車裡通關，移送到長安的皇帝面前。除了凱旋的部隊入關，還有張無瑒生平僅見的戰利品：寶石有十餘石，用駱駝裝載的黃金有五、六橐；<sup>88</sup>其他俘獲的大批戰俘和馬匹可以轉賣獲利。

高將軍返回長安，在慶典上領受榮耀。張無瑒的兄長張無價也在這次出征中立功，長安送來獎勵的證書：晉升兩級，獲得五品「游擊將軍」的資格。<sup>89</sup>但張無瑒聽兄長說，這次的勝利其實是欺騙、偷襲和搶劫而得。沒多久，粟特的王子決定報復，倒向大食，謠傳將聯手進攻唐土。高將軍匆忙趕回龜茲，主動率領數萬兵馬越關出擊，但結果是張無瑒生平僅見的慘敗：逃回的殘兵只有數千人，許多人在怛羅斯城陣亡或被俘。

從七世紀中葉，大食和唐分別向帕米爾高原的西、東兩側進軍，唐從高昌打到龜茲，大食一直進攻到怛羅斯。兩個帝國的征服都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在這個夾縫，許多牧民部族和城邦小國因而破碎，人群從此離散。每一次的戰爭，失敗者的政治結構都被破壞：國王被殺被俘，或失去權威與尊敬，人群的凝聚與連結更脆弱，分裂成更小的群體各自求生。在這片政治的破碎地帶，每個小群體的利益更分歧，更難協調更高一層的行動，忠誠與信任更浮動易變。<sup>90</sup>在怛羅斯，正聚集了一群喪失領袖、失去國家的突騎施和粟特人，各自飽受唐與大食的擠壓，備嘗挫敗、利益衝突和背叛的痛苦與憤恨。而唐之所以慘敗，最後也是因為背叛。

怛羅斯之戰慘敗後四年，張無瑒遭遇另一件生平未見的巨變：唐帝國在東北亞權力最大的將領安祿山，在西元七五五年也背叛反唐，率軍逼近長安。據說安祿山正是粟特與突厥混血的後裔，而他手下也有一批粟特出身的驍勇戰士。安西大都護府的主管抽調兵力回防，帶走一批部隊，龜茲國王也派弟弟加入，而張無瑒繼續留守柘橛關。他後來聽說，安西大都護府的高將軍和繼任的另一位將軍，都因無法抵禦叛軍的攻勢而被皇帝處決。但有關長安的安危，消息愈來愈少愈慢、愈不可靠，因為吐蕃人趁機進攻，切斷中華與塔里木盆地的聯絡，而東征的龜茲王子從此無法返鄉。<sup>91</sup>

之後某一年，張無瑒在五十多歲過世，草草埋葬在龜茲城外戍兵的墓地，死前他不知道唐能否渡過這場危機。結局是安祿山建國失敗，但唐的命運也和過去那些被它

<sup>87</sup> 拔汗那的使節：畢波，〈怛羅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歷史研究》2007.2：15-31。

<sup>88</sup> 750年之戰：除上引畢波之文外，另見錢伯泉，〈從《張無價告身》論高仙芝征討石國和突騎施〉，《民族研究》1991.3：51-58；許序雅，〈《新唐書·寧遠傳》疏證〉，《西域研究》2001.2：19-29。另見張日銘，《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頁56-64。

<sup>89</sup> 張無價、張無瑒兩兄弟的文書，見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頁517-520。

<sup>90</sup> 怛羅斯之役前中亞政治的浮動：張日銘，《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頁41-64。

<sup>91</sup> 這位王弟是白孝德。

擊破的游牧部族與綠洲城邦一樣：政治構造走向分化、破碎，直到滅亡。吐蕃人於八世紀告終之際，在上一次被逐出龜茲的百年之後重返，重新占領塔里木盆地，而中華的勢力重返高昌和龜茲則在一千年後。

## 終

許多國家與人群的新生都源起於背叛或起事，獨立和自主的欲望，不屈、不滿與不服的情緒，甚至報復的意志。這些情緒、欲望和意志可以扭轉戰爭的勝敗，改變帝國的軌跡。安祿山在東北亞的幽州（北京）密謀叛唐的前幾年，大概從他手下的粟特人，得知他父親的遙遠故鄉，被大食征服、承受外來統治的中亞，才剛發生一場革命，成功推翻舊王朝。<sup>92</sup>他肯定備受鼓舞。反叛是政治的常態，不論皇帝、可汗或哈里發，都不是非服從不可的領袖。安祿山燃起的反叛之火燎原中華的消息，一定也反向傳回中亞，撓動那些不安的心。

雖然安祿山最終失敗，但中華和阿拉伯的命運都注定步入褪色的秋天：兩個帝國都擴張得太大太遠，像膨脹的皮球，內部吸納太多異質性的人群。而這些人群各自擁有複雜的過去與記憶，挫敗的創傷激發了奮起之心。帝國的經濟力和軍事力，再也無法像一把錐子，突刺向最遠的出口。帝國退卻、離開和收縮之後，夾縫擴大，歐亞中央進入「後帝國」的年代，區域性強權擁有更多活動的空間。但之前被錐子擊碎的人群，比如突騎施，不能再形成政治主體，而是從屬於其他更有組織、領導力更強的族群或國家。

帕米爾高原兩側的帝國夾縫，演變不同。在西側，離散的粟特人各自融入周邊、外圍的人群：突厥、中華和波斯。留居家鄉的粟特人則是突厥化、波斯化和伊斯蘭化的三合一：因為突厥人的民族遷徙、波斯的復興和伊斯蘭的擴張。中亞人民不斷反抗，日後終於重建本地人的王朝，但人群的性格逐漸已不再是原來的「粟特」。<sup>93</sup>東側的歷史走向，第一步也是突厥化。唐退出塔里木盆地的綠洲邦國，吐蕃與突厥系新興的回紇繼續爭奪，最後由回紇取勝。吐蕃的政治結構接著和中華一樣走向破碎，因為內部的「不和諧」：背叛和起事此起彼落。

於是，從高昌到龜茲，塔里木盆地的綠洲邦國被動接受新一輪的外來統治，這次統治者是回紇人。在唐的年代，龜茲還保留本地人的王國，形成胡人「協力」、與漢並存的二元體制。但九世紀之後，這些半獨立的王國都消失，當地人徹底失去自己的

<sup>92</sup> 反叛的訊息流動：白桂思，《絲綢之路上的帝國：青銅時代至今的中央歐亞史》，頁 143-147。

<sup>93</sup> 薩曼王朝：B. A. 李特文斯基主編，《中亞文明史·第 3 卷》，頁 397；阿西莫夫（Muhammad Seyfeydinovich Asimov）、博斯沃思（Clifford Edmund Bosworth）主編，劉迎勝譯，《中亞文明史·第 4 卷（下）》（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9），頁 279。

國家。然而，繼中華和吐蕃之後，盛極一時的回紇強權同樣步入支離破碎的處境：遭遇氣候異常和宿敵的打擊，被逐出家鄉的草原，人群分裂成好幾支南下逃難，其中一支「移占」了從高昌到龜茲的綠洲，定居下來。<sup>94</sup>這是比外來的征服更緊密的統治。移占塔里木盆地的回紇人在人口和權上居於優勢，主導了這裡的突厥化。下一次帝國的進駐是十三世紀的蒙古人，蒙古人稱當地人為「畏兀兒」。

簡言之，沙漠之海的這一串綠洲島鏈，從七世紀到八世紀，反覆遭遇外來人群的征服，擁有重層的外來統治的歷史經驗。唐的治理超過百年，輸入中華的文書行政，寫在紙張上。繼唐之後的吐蕃，統治相對較短暫，但同樣建立一套縝密的行政制度，記錄在木簡和文書。<sup>95</sup>這是中華對面的「夷人」有能力，建立「征服王朝」的先驅。<sup>96</sup>下一輪入主的回紇人，則由粟特人協助經營和管理。<sup>97</sup>先行者的遺產也為後繼者提供基礎，有些設施比如屯田、戍堡和驛站，都留存而發展成聚落。<sup>98</sup>儘管仍有侵略者的威脅，但四周的帝國或強權相對弱化，移占的回紇人在此建立安定的政權，長達近四百年，平穩延續到十三世紀蒙古帝國為止。

外來的移占未必都能成功，比如十二世紀敗逃西遷的契丹人，雖然是勝利的征服者，但已無法取代回紇人。回紇人真正適應綠洲的新環境與生業，改變原先遊牧的舊生活，轉為農耕，逐漸成為塔里木盆地社會的主流人群。新統治者帶進新的語言和文字：回紇文，舊統治者的漢文和藏文最先被替換。接著是世居綠洲、過去各個邦國的本地住民，也逐漸失去自己的語言和文字：被統治、通婚交流與同化。外來的回紇人最顯著的「本土化」是改信本地歷史悠久的佛教。牧民中開始有僧侶，並運用回紇文去翻譯各種語文的佛教經典：本地綠洲先住民的文字，<sup>99</sup>以及外圍與對面的文字——漢文、藏文和梵文等。由此發展出蓬勃的文化和學藝，文化躍進的回紇人和鄰近的國家交流，卓然有成：前往吐蕃學習佛教，協助党項人的西夏國翻譯佛經，日後更成為蒙古人治國的助手。

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讓被統治者的舊文化逐漸消逝。十五世紀以後的伊斯蘭化，則讓這裡的佛教及其他宗教消失。藉由戰爭的征服，帕米爾高原西側傳來的伊斯蘭教，逐漸覆蓋這裡的綠洲城邦。回紇人被迫改信真主（安拉），舊有的寺院、佛塔

<sup>94</sup> 這裡指的是「高昌回鶻」，或稱「天山回鶻」。

<sup>95</sup> 吐蕃的行政：蘇北海，《絲綢之路：龜茲研究》，頁 105-118。

<sup>96</sup> 最早的「征服王朝」：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 333。

<sup>97</sup> 回紇人與粟特人的合作：森安孝夫著，陳嫻若譯，《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遊牧、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的形成》（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電子書），〈Part 4 粟特到回鶻〉；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2018，電子書），第七、八章。

<sup>98</sup> 繼承：付馬，《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9-13 世紀中亞東部歷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280-282。

<sup>99</sup> 回紇文佛經的翻譯：茨默（Peter Zieme）著，桂林、楊富學譯，《佛教與回鶻社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頁 30-82。

和壁畫則被破壞棄置，淪為廢墟。往後新寫的歷史都按照伊斯蘭教義的主軸來敘述。從此當地人只知道自己是維吾爾人和穆斯林，再也無法記得本地的過去曾經有過不同的歷史面貌。蒙古人雖然一度征服和統治這裡，但這些少數的統治者也被同化，融入維吾爾人，成為穆斯林。直到十九世紀英、俄兩國在中亞爭霸，一些特派員從當地的穆斯林手中買到斷簡殘篇的文書，寫著已被遺忘、無人能懂的文字，透露出在伊斯蘭的文化地層之下，似乎存在著不為人知的另一個歷史世界。

在這個故事中，帝國趾高氣昂、謳歌榮耀的時刻居多。那些被打敗、蹴散的人群被遷徙、被驅使，他們的故鄉理所當然被兼併，拼進更大一片領土中。這些人彷彿心悅誠服、轉換忠誠和認同，成為帝國大家庭的一員。失敗者似乎無奈接受權力、暴力打造的新「現狀」，但實際上不是。帝國每一次的顛簸，都有失敗者抵抗和反叛的「力」。

世界史上，被征服、亡國、移占和外來統治，失去自己的國家和失憶，都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而且一層又一層疊壓：新的現狀被覆蓋，成為歷史的地層。即便像回紇人這樣從「移占」到「本土化」，也在後一階段伊斯蘭的擴張中被迫改宗。在戰爭中被蹂躪，被新統治者同化的土地和人群，歷經各種非自願的轉型，從未獲得正義，而是逐漸萎縮，融混進主流的人群，加入「現狀」。

後記：感謝審查人惠賜誠懇而專業的建議。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北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慧立著，彥棕箋，賈二強譯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1。
- 唐·慧超著，張毅箋釋；唐·杜環著，張一純箋注，《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經行記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近人論著

大庭脩著，李茹譯

- 2018 〈敦煌發現的張君義文書研究〉，收入陝西歷史博物館編，《陝西歷史博物館論叢》第25輯，西安：三秦出版社，頁334-344。

小笠原宣秀、大庭脩

- 2003 〈龍谷大學所藏吐魯番出土的張懷寂告身について〉，收入大庭脩，《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階制》，伊勢：皇學館出版部，頁211-227。

王小甫

- 1992 《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欣

- 2013 〈高昌漢人的族群認同〉，《西域研究》2013.4：58-66。

王炳華

- 2010 〈玉其土爾古城與唐安西柘橛關〉，收入氏著，《西域考古文存》，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頁164-180。

王素

- 1998 《高昌史稿：統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付馬

- 2019 《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9-13世紀中亞東部歷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白須淨真著，柳洪亮譯

- 1999 〈吐魯番的古代社會——新興平民階層的崛起與望族的沒落〉，《西域研究》1999.4：45-54。

- 白壽彝  
1983 〈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收入氏著，《中國伊斯蘭史存稿》，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 56-103。
- 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  
2012 《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吳玉貴  
1998 《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震  
1981 〈麴氏高昌國史索隱——從張雄夫婦墓誌談起〉，《文物》1981.1：38-46。  
2009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收入氏著，《吳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74-389。
- 宋曉梅  
1991 〈麴氏高昌國張氏之仕宦——張氏家族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91.2：198-206。
- 李方  
2012 《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杜斗城、鄭炳林  
1988 〈高昌王國的民族和人口結構〉，《西北民族研究》1988.2：80-86, 282。
- 孟憲實  
2004 《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濟南：齊魯書社。  
2017 〈麴文泰與佛教〉，收入氏著，《出土文獻與中古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 193-206。
- 芮傳明  
1991 〈「曳落河」與「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3：頁 40-49。
- 侯燦  
1992 〈環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及其文化〉，《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2：31-34。
- 侯燦、吳美琳  
2004 《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成都：巴蜀書社。
- 姚崇新  
2019 〈從高昌到西州——中古吐魯番佛教寺院社會功能的轉變〉，收入氏著，《觀音與神僧——中古宗教藝術與西域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46。

- 姜伯勤  
1986 〈吐魯番文書所見的「波斯軍」〉，《中國史研究》1986.1：128-135。  
1989 〈吐魯番敦煌文書所見的突騎施〉，《文物》1989.11：53-59。
- 孫繼民  
2000 《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氣賀澤保規著，郭清華譯  
2017 《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荒川正晴著，沈玉陵、平勁松譯  
2013 〈唐代吐魯番高昌城周邊的水利開發與非漢人居民〉，《吐魯番學研究》2013.2：122-131。
- 馬小鶴  
2008 《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張日銘著，姚繼德、沙德珍譯  
2002 《唐代中國與大食穆斯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張平  
2007 〈龜茲考古中所見唐代重要駐屯史迹〉，收入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頁115-138。  
2010 《龜茲文明——龜茲史地考古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張廣達  
2008 〈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收入氏著，《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3-50。  
2008 〈唐滅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勢〉，收入氏著，《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14-152。
- 畢波  
2007 〈怛邏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歷史研究》2007.2：15-31。
- 許序雅  
2000 《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2001 〈《新唐書·寧遠傳》疏證〉，《西域研究》2001.2：19-29。  
2012 《唐朝與中亞九姓胡關係史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 郭平梁  
1988 〈突騎施蘇祿傳補闕〉，《新疆社會科學》1988.4：47-60。
- 郭峰  
2002 〈吐魯番出土衆阿婆社約與唐代西州的民間結社活動〉，收入氏著，《唐史與敦煌文獻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30-237。

- 陳倩
- 2015      〈公元 6-8 世紀吐魯番阿斯塔納地區家族塋院研究——以張雄家族塋院為例〉，《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6：51-55。
- 陳國燦
- 1980      〈跋《武周張懷寂墓誌》〉，收入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2 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頁 18-22。
- 2000      〈唐西州蒲昌府防區內的鎮戍與館驛〉，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7 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頁 85-105。
- 2003      〈從吐魯番出土文獻看高昌王國〉，《蘭州大學學報》31.4：1-9。
- 2003      《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 2014      〈玄奘與高昌王國〉，《吐魯番學研究》2014.2：6-12。
- 黃布凡、馬德編
- 2000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 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
- 2018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
- 森安孝夫著，陳嫻若譯
- 2022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遊牧、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的形成》，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程喜霖
- 2000      《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裴成國
- 2005      〈試論 6-8 世紀吐魯番地區人口平均年齡〉，《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6.3：19-24。
- 2016      〈唐朝初年西州人與洛州親屬間的幾通家書〉，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22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21-355。
- 2016      〈論 5-8 世紀吐魯番與焉耆的關係〉，《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3：127-132。
- 2016      〈論貞觀十四年以降的唐西州形勢〉，收入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 13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90-104, 325-326。
- 2020      〈高昌國末年以降磚志書寫中的「高昌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0.1：98-106, 215。

- 劉安志  
2011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蔡鴻生  
1998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
- 鄭炳林、黃瑞娜  
2020 〈敦煌寫本《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遼真贊並序》與石城鎮粟特部落徙居敦煌考論〉，《敦煌學輯刊》2020.3：1-17。
- 黎虎  
2000 〈唐代軍鎮關津的涉外事務管理職能〉，《北方論叢》2000.2：77-82。
- 錢伯泉  
1991 〈從《張無價告身》論高仙芝征討石國和突騎施〉，《民族研究》1991.3：51-58。  
2022 〈敦煌張氏家族和高昌張氏家族的關係〉，《吐魯番學研究》2022.1：1-12, 153。
- 薛宗正  
1984 〈突騎施汗國的興亡〉，《歷史研究》1984.3：93-111。  
2000 〈怛邏斯之戰歷史溯源——唐與大食百年政治關係述略（651-751）〉，《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0.4：85-100。  
2010 《北庭歷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屬西突厥左廂部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關尾史郎著，侯世新譯  
1995 〈論「作人」〉，《西域研究》1995.1：51-57。
- 蘇北海  
2010 《絲綢之路：龜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B. A. 李特文斯基（B. A. Litvinsky）主編，馬小鶴譯  
2003 《中亞文明史·第3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 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付建河譯  
2012 《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付馬譯  
2020 《絲綢之路上的帝國：青銅時代至今的中央歐亞史》，北京：中信出版社。

阿西莫夫（Muhammad Seyfeydinovich Asimov）、博斯沃思（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主編，劉迎勝譯

2009 《中亞文明史·第4卷（下）》，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茨默（Peter Zieme）著，桂林、楊富學譯

2007 《佛教與回鶻社會》，北京：民族出版社。

魏泓（Susan Whitfield）著，王姝婧、莫嘉靖譯

2020 《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著，王睿譯

2012 《粟特商人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著，阿米娜譯

2005 〈粟特柘羯軍在中國〉，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頁235-240。